

耶森尤克的軍官爸爸退休後參與冰釣和俱樂部活動，當他描述反普丁第四次掌權的傍晚和平站立抗議時，感覺四台鎮暴警察巴士快速反包圍並以非莫斯科方式親善驅離人群，是抗議者的冠冕。我們在聖彼得堡外圍舊軍事小島，島上沒什麼人，麵包工廠一間，幾棟水泥已消失的廢屋，年輕小俄們不時跑上跑下，他們沒有抽煙沒有帶酒不清楚在做什麼。樹林裡出現燒到只剩骨頭的蘇聯軍官戲院，骨架外一家人大火烤肉。引水入船的大型渠道已經完全乾燥，我們從五六層樓高的斷裂鋼道往下爬。海邊完全碎裂的鍋爐系統小屋，牆壁上「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我們從樹幹上滑向軍事設施底部，乾燥廢墟像是恆春將軍別墅和莫斯科「鋤與錘子」(hammer and sickle) 工廠，即便深夜走在軟綿綿的廢棄燒料越過地面黑洞以及無數寫著生產競賽名次的房間與讀書或演講室，也不會令人感到害怕。濕的廢墟讓人全身發麻，想到朋友帶我去即將拆掉四處生水的公共公寓，後頭一間不願搬離的老女人房發出細小的收音機聲響。一對情侶在海灘上烤火烘鞋，小俄野餐不精心打扮，也不拍攝愉悅照片，難怪可以殲滅拿破崙、納粹與瑞典軍隊。公車上的胖子和車掌小姐大吵一架，全車的人都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兩天後離開俄羅斯，歐美日本人士灌輸我關於西伯利亞鐵路的錯誤想法，全世界最長的鐵路不是浪漫的概念，西伯利亞崇拜犯罪文化與流亡家庭，殺人犯刺青聖母代表十八歲前入獄，頸上蛇代表毒蟲，人魚代表強暴，鎖骨小刀代表曾在獄中殺人並接受訂單，雙肩兩星腹部一魚代表身兼犯罪者最高首領 vor 與同志身分。西伯利亞地下非官方傳統擁抱反掌權者、反對擁有財富的文化，財富是懦弱者積累之物。西伯利亞窮山惡水黑域黑村，我食免費醃魚醃火腿辣生菜六夜七日，唯一學會的單字都是在車上學的。

「鋤與錘子」為蘇聯共產標誌，敲打的錘子代表工人，收割鐮刀代表農民，兩者結合意味工農團結，反抗外國干涉。夜晚潛入的鋤與錘子廢棄煉鋼工廠對面正對著普丁政府媒體大樓，工廠正門是聯外鐵路。我們戴上布手套，從公路邊緣一躍而下。馬辛希望保持隱形 (invisible) 狀態。我們無聲沿著貨運鐵路穿越草叢，進入大廠。

大廠建於一八八四年，員工於十多年前離開。腹地八十四公頃的內部空間遺跡，可以約略看出共產意識製造。自助餐室玻璃櫃傾倒碎裂，工人們在此領用工作休息時的午餐。閱讀室約有數百具書櫃龍骨斷裂，成堆書籍椎骨從龍骨脊柱縫隙墜落四散，棘突縱崎潛伏的書架龍骨像是關在博物館內的蠟質恐龍雕塑，往歷史奧義奔走。馬辛說，每隔一陣子廠內剩餘物就會更動，隨時會有人潛入翻舊取走共產遺物，飛彈模型、鋼琴譜、冷藏櫃、員工置衣鐵櫃、舊式蒸汽咖啡機所有物質作物，倒是白色封皮俄文版的馬克斯主義精神食糧被遺留在現場。馬辛用免費招攬觀光客的手勢揮了揮手中的中國各部族經濟問題研究叢書，不久，立刻將共產珍寶放回灰塵瀰漫處。

馬辛走在前，我走在後，黑霧瀰漫，兩手電筒燈束像是在空中刺察建築內部的筋膜齒突骶骨腹腔，觀察共產建制的運動載荷。共產龍骨覆蓋著勞動者光勳，黑板上寫著「鋤與錘子」的城市生產排序，共產共旺，集體息榮。所有房間都以攝影檔案註記優秀生產者與檔次、列籍。任何人難以評斷共產生產者與資本愉悅動物工廠和連鎖企業低工資者的差異，至少在鼓勵生產這個概念上，資

本與共產政府樂於促進勞動者的勞勉勤奮。無數的勞動激勵標語隨著游移光束從黑暗中警醒浮現。

「鋤與錘子」工廠勞動者的遊憩時間參與史巴克亞德（Spartakiad）練習。一九二八年蘇聯首次於奧斯陸舉辦以奴隸革命者史巴達克斯（Spartacus）為名的共產國際奧運。史巴克亞德以「不分種族 團結奴隸」為口號，迎戰具有希臘貴族傳統的布爾喬亞奧林匹克競賽。「鋤與錘子」大廠以團體競賽出名，其參與項目的評比內容為數千人之大隊操練、隊形變換、拋接競賽者、呼拉圈人龍、共產標誌千人快速排字。經歷蘇聯時期的雜誌讀者如此回憶史巴克亞德：

「一百呎短跑選手已經逼近終點。紅色選手上衣有著星字標記。黑色選手上衣則有著納粹卐字標記。紅色選手遙遙領先。」

「賽馬滑雪選手為紅色共產的鬥士、運動家與軍人。」

「女運動選手拿著標有布爾什維克字樣的手槍，瞄準我們的敵人，一擊中的。」

大廠內難見與史巴克亞德相關的殘遺事跡。畢竟紅色共產奧運停辦良久，唯有大街上的老婦兜售運動賽事郵票本，我原想蹲坐著挑選郵票，如同牯嶺街之傳統，塑膠套與細鉗在手。老婦揮了揮手要我按封面標籤上的定價直接收購，另外，滿口俄文向我介紹俄國文豪文本，讓我只能恭敬致歉。大廠剩餘的派對房垂掛著斷裂彩帶、鋼琴、細碎玻璃，以及彩紙剪貼而成的關於跳舞的語句。勞動者跳舞，如同二戰期受俄軍與納粹夾擊的華沙起義市民也在休戰小時跳舞、喝酒、迎向粉碎。

黑夜行走，人間考古。莫斯科地表是難以用第二外語鑽探鑿火的異陸歐洲，俄羅斯口岸加理寧格勒、聖彼得堡與阿爾泰正以焚燒爐、自卸翻斗車、壓路車與絞肉機銷毀自歐洲國家非法進口的食物。俄羅斯自食自炊。斯摩棱斯克總計銷毀五十五噸水蜜桃、油桃與蕃茄。奧倫堡銷毀二十萬噸奶酪。別爾哥羅德銷毀九噸奶酪。首都莫斯科則銷毀二十九噸運自加拿大、荷蘭與德國的醃肉製品與以及二十八噸的波蘭蘋果與番茄。民團青年組織突擊超市、俄國餐廳與食品雜貨店，搜查非法禁運食品。巨型卡車輾過黃色奶酪山道，以阿爾卑斯山斯攀登式單點攻入聳拔山勢。袒胸露臍的零時工將醃肉送進火爐，柑橘類水果箱堆成參天巨柱三三轟然倒下，內藏瓢瓣，汁泡種子四散，引起人道大國英美砲火抨擊，普丁外長反覆聲明自己正在進行一件嚴肅的工作。同時，從俄羅斯市場銷聲匿跡十五年的日本牛肉則捲土歸來，霜降牛肉如同雲霧榮耀重返莫斯科。

我後背包放著醃火腿、護照、盧布鈔票以及運動攝影機。我們走在漫無邊際的乾燥火絮之上。偶爾，大廠遠處傳來聲響，我們沒入齒突陰影，靜待匿名聲響離去。馬辛偶爾參與「多佐」（Dozor）

競賽。多佐為戶外地理定位解密遊戲，參與者在夜晚集合，驅車前往地屬偏遠的總部搜取情報，再依情報指示解密並防禦敵隊攻擊。數年來發生多起多佐隊員於遊戲地點附近身亡的事件，包括廢棄工廠墜樓、誤遭變電箱觸擊身亡、莫名窒息等。

黑暗行走如同鯨腹寫譜，盲眼徒手接物。二零零九年東京ミリオン出版社出版《廢墟手帳》拍攝長野縣上水內郡的賽莉諾廢棄旅館。深綠色壁紙包圍的矩形房間飄有殘破白色絲帳，滿地沙發海綿掏出物、匿名物事、碎裂玻璃。其中，一面牆上莫名繪有昭和六十三年名古屋孕婦殺害事件始末。名古屋空港搭乘金山往松本特急名鐵中央本線至長野縣約五小時，事件距今二十七年，而日本刑事追訴期亦從十五年改至二十五年，最末於二零一零年取消追訴期限。名古屋孕婦殺害事件轟動一時，新聞評論者認為案發前日三月十七日深夜電視節目曾介紹歌川國芳門徒月岡芳年和落合芳幾所創作的《英名二十八衆句》，其中芳年之作以「將勒斃的孕婦開腸剖肚、取出胎兒」為主題，進行創作，反應幕末至明治維新初期社會動盪之殘酷現狀，此事應與殺刀案有關。

細蟻，行走於墨色奇卷，胸足沾染墨漬，拖曳成言。據信，名古屋孕婦殺刀事件與老鼠講（日文之老鼠會）相關；事件重大，警察部門諱而不言。昭和六十三年，上班族守屋靖南快步返回中川區自宅，時間傍晚七點四十分，新妻美津子仰臥電暖爐旁，頸部遭電源線纏繞，電線一端仍連結著插座。美津子雙腳間為虛弱啼哭滿身是血的嬰兒以及三十公分捲長的臍帶，新妻遭利器剖腹當場亡命。靖男倉促間無法找到家中電話，火速奔往鄰居家中報警。勘驗小組勘查後發現，美津子被切開的子宮內置入一台按鈕式電話與米奇鑰匙圈，兩者合意正為美津子從事直銷工作並賺取財富之代稱：老鼠講。名古屋孕婦刀害事件無疾而終。賽莉諾廢棄旅館牆上莫名手繪封存二十七年前前的謀殺案，兇手至今未逮，血嬰業已成人。黑色輪廓勾勒孕婦裸身並佐以文字說明，肚臍上刺入一把匕首，入腹處則為兩道紅色血漬狂滾滾落。繪者為賽莉諾旅館廢棄前之訪客？如此一來，繪畫定遭抹飾。繪者為賽莉諾旅館廢棄後之訪客？為何對二十七年前前的命案情有獨鍾？為何獨自在憂森奇魅的廢棄旅館作告示畫？廢墟代表意志灰飛煙滅後，肉體的殘餘。如同波蘭前衛貧窮劇場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往往任表演者在森林盲裡狂奔直馳，裸體奔馳為其傳統鍛鍊之法。奔馳的是身體，拋擲的是意志。而森林則是淹沒眾生之口。

隱蔽五官，隱匿身世，隱匿死情，隱匿翅足墨跡，隱匿臍帶組織，狀若光華透明。隱蔽才德，繪於亂世之卷，隱匿右耳，屠屠獨行。旅館獨室，氣味不安。屠殺乃逃避遺忘之法，匕首乃取腹求生之義，亂世安穩，不欠殘忍。大廠曾於年前焚燒，狂縱火乃資本政府愉悅俳句。昨日煙霧瀰漫，大廠骨皮骨，炸裂房間事物渙散，危牆崩殂，不見哀榮。大廠，如實呈現共產細胞。犬與虎同桌謀皮，虎得利。史達林建立廚房工廠（factory kitchen, or communal kitchen），以中央集體廚房取代家戶烹飪，實行婦女家務解放，實踐男女平等。同一時代，史達林將俄國革命後廣

為設立的勞改營（gulag）<sup>1</sup>重整，奴役其民，坐罪流邊。勞改營駐於北極圈至西伯利亞東部酷寒之間，延伸至中亞南區，單年監禁之犯罪者、政治思想犯皆為百萬人之譜，並進行單調嚴酷的伐木整地、縫紉軍服等勞務工作。勞改營以違背左翼共產精神之姿獨行於惶惶暗處。犬虎共行，偏利共生<sup>2</sup>，左右陣營政府組織，皆於末梢表淺處敗壞，人民行於雙翅目蠅蛆熒熒之上。

我透過人造衛星八號網站搜尋到馬辛的資料，當時他正準備從莫斯科騎腳踏車至以色列深遊。馬辛擅長軍事遺跡探勘，包括位於聖彼得堡外圍懸浮於芬蘭灣海面神似軍艦島的亞歷山大碉堡（Alexdar Fort），組織者在九零年代時往往透過船隻往返輸送派對者上島，飲酒嗑藥。亞歷山大碉堡以環型建築著稱，雖為軍事碉堡卻從未參與任何實質戰役，俄國政府也曾改建碉堡為黑死病疫苗實驗室。人造衛星八號網站也有青年組織莫斯科地底自來水隧道探險，參與者需著溯溪裝備，沿著管線攀爬至市中心地底，自負安全；另有青年率隊潛入俗稱七姊妹的史達林建築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莫斯科為重振積弱市容，建立規模龐大的蘇聯宮殿，而七姊妹正是遙相呼應的附屬建築，此建築群涵蓋巴洛克城堡塔、哥德式建築與美國三零年代摩天大樓之雄奇特色。組織者率領外籍人士潛入文化人公寓，直抵建築最高處的共產榮耀金星，該建築備有超過四百五十間公寓房間，提供蘇聯時期航空業者、測試飛行員、共產黨委員會委員等使用。

七姊妹建築群中的莫斯科大學位於市立大馬戲團附近，大帳篷內看小兒體操、騎馬狂言與動物踩輪為所有俄羅斯人的冬日童年回憶，俄羅斯人有無數關於領導者雕像頭的都市傳說。深受律師執照考試挫敗的葉夫更尼與我在列寧遺體排隊人潮外聊起天來。列寧身材均勻短小，遺體面貌精細深邃，四周燈光柔和莊嚴，此共產領導者一手握拳、一手平放，端躺於玻璃花箱內，探視者不得嬉鬧。失敗律師葉夫更尼身材微胖，五官細緻，穿著白色西裝襯衫，羸羸弱弱提著公事包。葉夫更尼隨我走過森林、池塘至麻雀山上的莫斯科大學，該校設有人類學博物館、動物博物館、四座天文觀象台、文化宮、大學生劇院以及十一個食堂與十六個咖啡廳。據傳，當年被割下的列寧雕像頭就藏於大學地下室。據傳，當年被割下的金色列寧雕像頭就藏於新的史達林雕像頭裡面。據傳，當年列寧雕像頭被打碎成四十三個碎片，藏於擁護者家戶。據傳，每年列寧誕辰擁護者齊聚列寧故鄉烏里揚諾夫斯克市的小教堂地下禮室，觀賞列寧紀念雷射秀。俄羅斯大學建築氣勢恢宏森嚴，上千個矩形窗戶透出黑暗陰影，主建築對面則是俄國著名科學家、化學家與數學家之白色頭部雕塑像，以及陣列式宮廷花園。大學內部道路成為重機愛好者的飆車聚集地，不少中年飆車

---

<sup>1</sup> 蘇聯勞改營始於一九一九年，後經史達林大刀闊斧整頓設計。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間共收容一千四百萬人，獄所共計四百七十六處，北極圈區域之勞改營特為惡名昭彰。勞改營收容者為竊盜與犯罪者、政治犯，甚至有因開蘇聯政府玩笑或隨意曠職而入獄之無辜者，半數以上的勞改者未能獲得公開審判的權利，任秘密警察遂查結案，或殺之不審。

<sup>2</sup> 偏利共生（Commensalism）為生物共生關係的一種。兩生物間之某一生物因相互關係而得到生存利益，另一生物則沒有獲得益處或害處，僅帶動對方去獲取利益。共生者（commensal）指獲利方，其英語源自拉丁語之「com mensa」，原意為「共用餐桌」（sharing a table）。

族穿戴全套皮衣眼罩配備，手擁少女，腳邊無數啤酒瓶，坐在長凳邊休憩。

城市正是假造歷史的手段培養地，而俄羅斯更是雕像愛國主義的創始者。列寧站立於摩天大樓頂部揮手、列寧踱步沈思、列寧演講、列寧平躺公園、列寧舉手向天；西伯利亞邊疆區域則有以巨樹排列而成的「列寧一百歲」字樣，若行過空中必能見得。日前侵佔克里米亞的普丁政府預計於首都建造二十四米的弗拉基米爾大公（Vladimir the Great）雕像，現代俄羅斯先驅以及第一位基督君王弗拉基米爾成為官方吹捧的歷史人物，即將破壞天際線的君王雕像呼籲市民必以俄羅斯為榮，而雕像主人公本身更被官方譽為克里米亞傳統的建造者，以敵烏克蘭。蘇聯時代的聖像毀壞運動（iconoclasm）搗毀革命者的死敵，聖像。教堂被改造成公車站，而東正教聖母像則被遷移至射靶場。

俄羅斯境內沒有紅色恐怖紀念碑或博物館。唯一蘇聯政府受難者紀念儀式在小公園舉辦，並從清晨朗讀死難者姓名直至深夜，口乾舌燥，呵欠連連。馬辛表示自己對共產時期沒有任何興趣。蘇聯時期舉國歡騰穿越西伯利亞不毛之地的全世界最長的鐵路，莫斯科貴族藝術學院學生們表示，那不過是窮人運輸。聖彼得大帝建造尖錐高塔，從塔尖讓反叛者滾落直墜河底。數個冬天後，權力異位，史書重新編纂，落難者加官晉爵，虐待塔改為軍砲塔，官方命名抵不過鄉野耳語。耳語，如同地方幽靈，與虎謀皮不成，遂退居暗位，靜待兇斃。

歷史正是假造集體幻象的母帶。蘇聯與強國後代在腦內交戰。強國後代樂於譏諷普丁政府，干涉他國內政。西伯利亞火車內與我每日在棉被內偷藏冰啤酒防警，咀嚼貝加爾湖乾魚的女人，提起普丁立刻拍起肥碩胸脯以簡單的英語表達崇敬之意。其他人不然，其他百分之十的俄羅斯人民不然。當所謂的反叛者深鑿歷史並認同反叛政府的革命者歷史時，往往難以處理革命者所屬陣營所建構的歷史暴行。所謂政府，往往是當年的反叛者。所謂的反叛者若沒有滾落虐待塔，往往靜待來年，尋求施暴革命之日。

莫斯科乾燥無雨，也因此大廠無水。遊魂，避免無水之處；惡靈，長據陰鬱之所。美國奧本鎮曾經發明淋浴刑。囚犯頭部被放進木製水箱並以卡榫固定，手部以皮製束帶網綁在椅把，腳部則網綁於椅腳。囚犯端坐受刑，由衣冠典雅之獄方人員執行灌水。囚犯多半在行刑完畢解開束縛拖曳回房時才於無水狀態溺斃，延遲瞬間被稱為「死神回盼」之際。群眾全然包圍事件動亂處，如同舊時國慶煙火，當權者居於高處玻璃室觀看，行刑者緩慢用餐；某些時候國家謀殺現場販賣受虐者畫報，刺激圍觀者對受刑者之敵意。鬼丘鬼鏟於台北公會堂執行奧本鎮淋浴刑，該處為日本二戰受降典禮會場，然而日軍實際投降地點為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禮堂，並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與親暱友人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共同於受降書簽字。台北公會堂所舉行的台灣地區受降典禮造成當時萬頭鑽動、人心激昂。鬼丘鬼鏟台北公會堂淋浴刑本身即為「歷史重演的重演」（the reenactment of historical reenactment），等同於複製二次的第三件複製品，或者是在複製的歷史事件中複製另外一件歷史事件。所有歷史事件都包含全然複製的元素，複製者

將複製卵置入胸腹，潛游入海，靜覓吐魂之所。

長野縣謀殺告示畫作貌似犯罪者檔案，繪製懸疑之地，國家針對個人所行使的犯罪則以照相檔案術記載。蘇聯時期國家警察組織以代號將犯罪者五官、身形、器官距離定譜，並由人類學者與刑案軍官針對犯罪者刺青符號進行解密，以利判屍、判刑與監禁管理。犯罪者肉體如同山谷鳥類標本銘記犯行、受刑年限、入獄時程間隙與犯罪觀，然而，犯罪者以尿液、橡膠燃燒與電子刮鬍刀鑄記的圖像乃以地下犯罪組織集團為受檢者，而非實際擁有監禁裁判權的國家單位。鳥類的飛行心情難以註記，蘇聯地下組織者則視政府為必當剷除的死敵；中央政府榮譽建造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所穿越的正是犯罪者的內臟六腑，無政府主義之重鎮。日本無緣死搜查隊以配有廣播系統的黑色警備艇巡河，冬霧，巡查官站在馬達旁打著冷顫，等待無名屍撞擊上汽艇的一刻，這一刻被稱為「無名行旅人的最後散步」。行旅者的後腦勺在冰冷河水中忽沈忽浮，另一名執勤巡查官踉蹌地站在警備艇邊緣，用U型金屬長鉤翻揀無名屍西裝外套，設法勾住無名男性的皮帶扣環並將對方拉上已緩緩降至河面高度的打撈貨架。巡查警官以燒杯採集海水樣本，作為可能的他殺物證與懸浮物檔案，隨後發布二十二字數的死亡公報，簡潔描述身故狀態。河面死亡者的遺物吹乾後將放入牛皮紙袋，牛皮紙袋與分類好的文件、證件將納入同一編號的紙箱，紙箱會放入檔案室的貨架，貨架上其他條件相仿的行旅者。未來，可能在同一時間並行焚燒。

現代社會無名行旅者的遺物多半為可以放入口袋的皮夾與手機，戰爭或屠殺行旅者的遺物則多為基本生活物件。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共藏有一噸重的頭髮、十一萬雙鞋、三千八百個行李、四百七十具義肢、八十八磅重的金屬眼鏡、數百個劇毒農藥罐、數百個牙刷與木梳、三百七十九件條紋囚衣、兩百四十六件祈禱披肩以及長達七十七呎長的納粹軍方檔案，包括監禁者衛生檔案、電報、建築藍圖。莫斯科二手市場可購買蘇聯黨證、人民身分證、軍章、救護隊旗幟、航空救生衣、生鏽電湯匙、手提照明器材以及八零年代仿製美國型錄製成的計算機。遺散物事可輕可重，納粹監禁者的毛髮組織仍舊存活於德國家庭的地毯、汽車內裝人造纖維、繩索、毛毯、床墊填充物以及潛水艇隊員毛襪與鐵路工人硬靴內。

西伯利亞鐵路車廂劇烈晃蕩，七日行徑穿越七個時區，難以計數的城鎮。我坐在海參威火車站半日後，終於在深夜中，吹著冷風，進入昏暗照明的二等車廂內。火車虎虎生風，晃蕩地難以形容，所有乘客的腦內物事，都或許在強烈撞擊後遺散，日以繼夜地奔馳在荒涼的西伯利亞之境。北極圈、東西伯利亞與莫斯科市輻射地帶向為俄國勞改營建置之處，史達林時期更將勞改營一舉改造為促進工業活動與經濟繁榮的人力工廠。一九六零至八零年間，蘇聯境內至少有三千五百萬人因實際犯罪行為、濫捕或政治因素入獄，並進行森林伐木、煉鋼、縫紉警服等勞改工作。對犯罪者而言，刺青代表其榮譽犯行、地下社會特權與階級，等同於虛擬的武器與最末日貨幣。

**Бог против всех, все против бога**

**神反對所有人 所有人反對神**

我前三次入獄都是因為搶劫，  
在獄中以刀片、熱膠與尿液作染料刺青，  
雙肩上的八角星標誌劫盜本業。  
最後一次判刑是因為毆打女人。  
當新犯行被揭發時，獄中成員警告我，不得再以劫盜為業。  
強盜生涯就此終結。  
現在雙臂上的新刺青意味著：我獨自在冰山漂浮。

西伯利亞有著強烈的反權威傳統，耶森尤克說和居住在西伯利亞的親戚根本難以溝通，而當地文化視犯罪為反叛的象徵，入獄記錄為男子氣概的實質表現。然而，當新成員進入犯罪圈以後，往後自難進入普通社會。由於西伯利亞備有百年流放、監獄、勞改之實質功能，因此當地居民職業往往與獄所息息相關，西伯利亞區域容納了受監者、獄方管理人員、出獄者與普通居民，由於獄方管理者亦與當地居民甚或出獄者結婚生子，因此俄羅斯人往往認為該區域早已與犯罪文化密不可分，任何人都難以自身其外。

七日之間，火車少有喧嘩。俄羅斯人以冷漠著稱，但西伯利亞區域上下的乘客更顯生疏感。旅客多半進行一日至三日左右的旅程，基本配備為茶杯、沖泡式咖啡粒、軍事刀叉組、書本雜誌以及很快會失去網路訊號的手機。每節火車皆有兩名隨車女管理者負責，她們將分配午餐、整理地毯與廁所、收拾各車廂垃圾、販賣紀念品、管理小孩，以及指導語言不通的旅客。我的車箱位於餐車後部，因此可以最快取得溫熱的無味午餐與兩片紙麵包。旅客彼此交談，有時也彼此討厭。四人車廂裝設左右兩側上下舖，我的床鋪就懸掛於牆面，以蝙蝠之姿，穿越俄陸。

## 出國行程表

1. 台北→海參威（2015/06/02）
2. 海參威→莫斯科（2015/06/05-11）
  - 西伯利亞大鐵路
  - 參訪地點：
    - 紅場美術館群
    - 莫斯科大學人類學博物室
    - 莫斯科當代美術館

Strelka Institue 窩瓦河團隊訪問

### 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3. 莫斯科→聖彼得堡 (2015/06/20-25)

隱士廬博物館

4. 聖彼得堡→華沙 (2015/06/25)

華沙起義館

華沙當代美術館

華沙現代美術館

華沙歷史博物館

海報博物館

Krolikarnia Sculpture Park

Lokal 30 Gallery

奧斯威辛集中營

5. 華沙→巴黎 (2015/07/10)

龐畢度美術館

太陽劇團

比利時實驗舞團 Peeping Tom/Vader

參與巴黎即興音樂家 Hugues Vincent 與台灣駐巴黎資深作曲家王雅平所舉辦藝術家聚會，嘗試演奏即興鋼琴

6. 巴黎→台北 (2015/07/16)

### 附錄二：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對照與啓示

### 附錄三：對於個人、國內藝文工作者及相關領域的啟示

(本文以附錄二與三為出發點，重新整理此趟旅行所感)

目前俄羅斯當代藝術狀態仍舊明顯受到政府意識形態的過濾與審核，普丁政府除食品禁運外，對藝術家的控制也日益縝密。普丁政府對內強調「穩定」(stability)的重要性，而所謂的穩定表現在經濟成長、逐漸膨脹的中產階級人口之上，而俄羅斯中產階級亦同步肯定普丁政府所建立的政治穩定基礎。然而，複雜的俄羅斯歷史並沒有停滯在普丁時代，儘管普丁政權很容易讓俄羅斯當地人產生一種近似後蘇聯列昂尼德·伊里奇·布里茲涅夫(Brezhnev)治理時期的相對穩定感，不過人們仍舊開始質疑所謂的經濟成長不過就是建立在漂浮油價上的虛幻，而中產階級沒有介入社會議題的管道，亦讓許多人開始對普丁政府有所質疑，此番質疑聲浪於二零一一年底抵達高峰。

## 所以，俄羅斯當代藝術世界是否相對沈寂？

蘇聯時期，當代藝術被迫走往地下並且與官方保持模糊而彼此警戒的距離。相反地，一九九零年代開始，由於藝術家普遍受到超級富豪與社會上流的支持，因此快速獲得合法 (legitimate) 的特權地位。然而，自二千年始，俄羅斯當代藝術以其政治論述匱乏的狀態，成為中產階級的新娛樂、資本家的洗腦工具<sup>3</sup>；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籌碼。當代藝術僅僅成為標誌創意中產階級 (creative middle class or creative elite) 的工具，而非社會議論動能的觸發者。所謂的創意特權階級可以以我參訪的 Strelka Institute 所屬的紅色十月巧克力工廠 (red October chocolate factory) 為例，該區域為莫斯科著名的藝術特區，除結合以開放自主教學模式著稱的教學機構外，亦包括盧米爾攝影展覽館 (Lumiere brothers center for photography)、酒吧派對區、文創商店等；該區域如同華山藝術特區，不但躍升文化知識份子最頻繁集聚的城市會所外，也組織大小戶外電影活動、城市論壇；即便紅色工廠區域成為莫斯科最具西歐風情的開放式文化據點，但是觀照所設計規劃的夏季活動，仍極少具備現實社會批判性的力道，至於後蘇聯時期 (post-post soviet) 的俄羅斯文化世界何以在十多年內快速地演化成西歐民主模式，而西歐民主模式是否值得全球模仿？這更令來自台灣的我深深思索。

基本上，被西歐媒體讚譽與關注的紅色工廠區域更接近城市行銷的模板，Strelka Institute 的校所即便以相當近似荷蘭、北歐等國以開放式工作室並結合生活設計感而成，然而，相較於其他莫斯科區域甚至西伯利亞區域而言，莫斯科文化階級似乎最蒼白而毫無特色。莫斯科的紅色工廠區域，無非是普丁向西歐展示其開放態度與多元包容的樣本，Strelka Institute 的研究所學生與我進行訪談時表示，學生之間極少討論政治，並且普遍對反抗抱有消極而不可行的態度。此外，由於執政黨支持者約佔全國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比例，因此多數人會盡可能地避免政治話題，而意外開啟的政治討論多半以咆哮爭執收場。當然，或許以這幾年台灣反全球化與公民抗議的場景相比，俄羅斯自然相對沈寂也危險許多，市民也深知安全界線在哪，但是儘管將時間探針往後挪動，莫斯科知識份子的極度西歐化，絕對會左右莫斯科未來發展的藍圖。波蘭華沙當代美術館策展人瑪莎·丹瓦斯卡 (Marta Dziewanska) 觀察，「早期俄羅斯抗議浪潮多半由『創意』中產階級所主導，極力爭取自由，然而，他們所爭取的多半為獲得國際 (歐洲) 消費者食品、包括文化商品等的自由，以及知識特權階級之於非民主社會的特權地位。即便左翼抗議者仍舊疾呼教育自由、醫療體系建置以及關注移民處境等議題之重要，但是主流自由派 (liberal mainstream) 仍舊視於歐盟區域自由旅行以及加強前蘇聯區域之邊界防守，為其公民權 (civil right) 運動之主張。」

---

<sup>3</sup> 參考《Post-Post-Soviet? Ar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ussia at the Turn of Decade》，編著者：Marta Dziewanska。

出發前，我謹慎地將所有針對普丁政府的西方批評打上問號，畢竟歐美主流新聞世界向來對中國、俄羅斯、越南等非民主傳統之國家，有所批評，報導亦有偏頗，這點我在美國與中國居住的時期，就已深刻體認。而由於俄羅斯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對非俄羅斯語系的人來說，所有文化評論的發球權仍然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上，因此，我僅能以模糊的工具，探測模糊的地景。



即將要改建為新興中產階級住宅區的鋤與鐮刀廢棄工廠

綜觀莫斯科，不乏有許多「超級計畫」(super project)正在進行。以我實地探查的莫斯科鋤與鐮刀蘇聯工廠為例，該工廠在休廠後閒置許久，由於場地仍具有毒性物質與重金屬殘留等疑慮，以及其所代表的舊蘇聯時代形象等因素，連帶造成莫斯科西城的地價下滑，並成為不動產業者心中的頭號黑名單。工廠閒置期間，該廠遇上全球都更區域都會莫名遭遇的深夜大火<sup>4</sup>，隨後，工廠場地進行全球性招標，並由著名的丹麥建築團隊 MVRDV 取得設計案，計畫將該場地打造成可容納一萬九千名住戶的中產階級住宅區、時尚專區與大型生態公園。參照紅色工廠翻修設計後對當地地價的拉抬作用，鋤與鐮刀蘇聯工廠亦將徹底拋棄左翼實驗與思想，將自我編制於資本發展之中。



高爾基公園腹地廣大，包含沙灘排球場、美術館、音樂場地、遊樂區等

<sup>4</sup> 莫斯科建築學院 Strelka Institute 學生表示，寸金寸土的莫斯科城市仍舊不時發生都更地段的不明縱火案，尤以當地居民與建商發生意見不合之處最為頻繁。火案多半發生在深夜，並且幾乎多以偵查結果不明結案，建築系學生表示，縱火者的身份不言而喻，然而媒體對此現象噤若寒蟬。

實際上，當代藝術也成為超級計畫的一環。以莫斯科最著名的高爾基公園（Gorky Park）為例，高爾基公園建於一九二八年，當時蘇聯政府以「未來城市」的概念，打造出屬於莫斯科的中央公園，並認為該處為莫斯科居民的文化集散地。歷史悠久的高爾基公園向來反應時代特色，蘇聯時期市民們沈浸於共產奧運熱潮，並熱烈擁抱大型運動賽事，爾後，高爾基公園亦成為後蘇聯時代的娛樂場景，設有約一百處的娛樂設施。二零一一年開始，高爾基公園進行大規模的整頓改造，目前高爾基公園仍舊受到莫斯科市民的熱烈喜愛，除了跨國企業耐吉與愛迪達公司負責的超大型健身房與滑板公園，以及大型商業活動<sup>5</sup>外，公園內部甚至建立了當代藝術館。

「車庫美術館」（Garage Museum）原本位於老舊火車站內，由社交名媛朱可娃（Dasha Zhukova）主導的當代美術館於今年二零一五年移至高爾基公園，我恰巧參與此藝術盛事。車庫美術館以超級大展作為開幕序曲，廣邀草間彌生、維多柯爾（Anton Vidokle）等重要藝術家之作。開展前，莫斯科市不時可見印有「車庫」字樣的歐迪轎車穿梭，開幕現場除以時段與出入口明顯區分出超級貴賓、藝術圈重要人士外，亦僱有多名重型保鑣。開幕活動包括觀眾自行絹印博物館紀念 t-shirt、由推車服務生發送現場窯烤製作的傳統俄羅斯餃、橫放現場的乒乓球桌等。現場氣氛沸沸揚揚，這裏一點也感受不到莫斯科政治緊繃的氣氛，還帶有愉悅的西歐偷渡感，車庫美術館的疲憊空洞效應絕對不亞於龐畢度美術館，只是誰又能質疑西歐藝術文化的份量？而全球化底下的任何國家，誰又能夠自身於強權控制之外？



高爾基公園內的車庫美術館開幕成為歐洲藝術圈盛事

對莫斯科較為富裕的文化階級乃至於任何具有空間移動能力的旅客來說，在俄羅斯境內的任何兩個城市移動，困難程度遠高於飛往其他歐洲國家。我不時聽到俄羅斯人向我表示，整個俄羅斯都是未知土地，他們對奧姆斯克（Omsk）、窩瓦河（Volga River）與西伯利亞區域的陌生，遠遠超過巴黎、倫敦與義大利，當我談起西伯利亞犯罪文化或中俄小鎮時，他們的面部表情僵硬一片茫然，而這股茫然往往會在話題轉向巴黎、倫敦時緩緩甦醒；也因此，不管是西伯利亞鐵路同行

<sup>5</sup> 在我數次拜訪高爾基公園的經驗裡，不時會偶遇耐吉公司舉辦的超大型千人戶外瑜珈熱舞活動以及滑板競賽，其製造噪音與複製大眾化庸俗的能耐無人能及。然而，以演唱會規模推廣戶外瑜珈，確實成功得到市民的注目。跨國企業的城市行銷於莫斯科成功探鑿出新的腹地。

旅客或莫斯科貴族藝術學院的學生，都對我搭乘了七日火車表達訝異，並以簡約的英文稱呼我為「冠軍旅客」，但另一方面，作為蘇聯時代最榮耀的象徵品之一的西伯利亞鐵路，仍舊勾引出他們難以肯定的後共產厭惡。所謂的共產懷舊（communism nostalgia）自然發生在許多年長者身上，耶森尤克提及許多度過漫長蘇聯時期，並擁有貧窮但極具社會主義集體目標的人，因為在新資本主義時代缺乏一技之長，而染上酗酒等問題，潦倒以終。而對新生代而言，蘇聯時期往往是個不值得探究與懷念的陌生時期，而此股共產厭惡也不免與紅色恐怖、政府宣傳謊言有關，而今，他們亟欲探索的新世界自然有著一定指向，但那絕非位於西伯利亞鐵路能企及之處。



聖彼得堡廢墟探查

對於莫斯科人而言，我所探查的西伯利亞鐵路與舊工廠，是亟欲擺脫的過去，那代表共產時代自以為是的幸福與驕傲，好比著名的共產謊言宣稱不鏽鋼為蘇聯工人無意間的發明，然而當時多數歐洲國家早已有不鏽鋼製品。同樣地，波蘭首府華沙也四處可見約莫四五十歲出頭的流浪漢，共產主義的歐洲幽靈化身正是無所不在的流浪漢。同時經歷兩種歷史斷代者最為不幸，也最缺乏翻身伎倆；成功進入新資本主義時代並佔據較好社經地位的多半為與西方世界有所連結的人。



藝術家於奧斯威辛紀念館展牆以 1:1 比例重繪受難者孩童所藏匿的繪畫，繪畫多半藏於集中營角落，多數孩童不幸罹難

反觀行程中的第二國家波蘭。事實上，該國歷史以及它與四周強權的關聯與台灣更為相似。而其作為小國的反思以及對歷史關注的程度，也令人十分激動。十九世紀時，波蘭曾經於世界地圖上消失一百二十三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得以復國。二次大戰時期，波蘭在納粹德國與俄國的夾擊殘殺下很快地再次滅國。當我和波蘭人相談時，往往感覺歷史與他們個人的關係更為密切，他們似乎不以第三者的眼光觀看歷史，如同我的朋友一名華沙國家美術館日本漆器與武士用具修

復師喬安娜所說的，「所有波蘭家庭都在二戰中失去至親」。



波蘭設計師希爾伯特 ( Hubert Hilbert ) 曾參與華沙起義之戰鬥，爾後於共產時代仍舊努力創造出風格獨特、開放的設計作品，其合作對象多與閱讀、音樂、建築展覽相關，或許，是為隱性的文化抵抗

作為波蘭首府的華沙市曾經經歷反納粹最激昂的革命：華沙起義 ( warsaw uprising )。拜訪華沙起義博物館得以親見當時全華沙市民投入抵抗運動之慘烈。由於納粹進攻波蘭時，波蘭復國不滿二十年，政治系統體制紊亂，並分裂成多個社會運動路線，當納粹侵門踏戶時，波蘭人很快地決意死戰，冀望獨立的心情強烈而不容質疑。以華沙為例，居民自主分隊為游擊部門、媒體部門、醫療部門等，醫療團隊在壕溝邊診療，七歲男孩成為送信兵，當時的地下革命報紙以千張為單位進行大規模發送。拜訪華沙可以在不同的博物館內體會他們對不同時代歷史的不斷觀察。華沙起義博物館與觀眾的互動相當細膩，一進門可見一排電話亭，透過照片所做的真實人物之導引，民眾可以接起電話，聽見華沙起義份子的錄音。博物館內有一堵橫亙中央的三層樓黑牆，當觀者臥伏在黑牆面時，可以隱約聽見戰火聲與廣播；現場也擺放當年對戰戰機，但以燈光投射與陰影利用，使其情緒程度降到最低，悲傷，但隱隱約約。此外，由於納粹所建造的最大規模集中營奧斯威辛即在波蘭境內，也因此，社會輿論因此一集中營博物館而起的辯論，往往讓波蘭博物館對於歷史的呈現、真實的細膩程度以及轉型正義的博物館實質作法，有諸多進步的呈現。



奧斯威辛集中營展覽受難者遺物，並組織科學團隊進行修復，使之保持在「原始」狀態

事實上，波蘭境內對受害者生命呈現的方式一直有極大爭議。二戰期間波蘭失去近六百萬之人口，包括猶太人與普通市民等在內。波蘭一直有反對者提議將奧斯威辛徹底抹平，讓其實質建築地景消失。但保留派仍舊佔多數。奧斯威辛紀念館不以任何建築設計或藝術方式呈現戰爭受害者，他們採取完全呈現迫害空間與受害者遺物的方式，記述歷史。該博物館收藏保留當年在當地死亡

受害者之遺物，包括原以為來此勞改者所攜帶的行李、眼鏡、義肢、囚衣。其中最為爭議並往往在社會辯論中傷及部分族群情感的，即是受害者的頭髮。難以計數的受害者頭髮纖維被保留在博物館內，而保留受害者的頭髮引起受害者遺族與生還者的抗議。最終，頭髮成為館內唯一不進行修復，並待之自然灰飛煙滅的遺物。波蘭經歷創傷歷史，但對我而言，華沙市的精神風格仍舊相當穩定、溫和而努力尋求客觀；其博物館徹底呈現日本社會學者「現場百回」的精神，反覆翻檢歷史遺物與保存一瞬間的時代精神。波蘭，相較於俄羅斯所經歷的歷史，似乎更貼近台灣許多。波蘭博物館群一直在拉近與拉遠歷史距離的選擇間遊走，企圖尋找並建立小國溫和但篤定強健的自保態度，這點令我感動許久。而波蘭在消失一百多年後甫獲得獨立地位時，決定迎戰納粹，卻因此粉身碎骨，此事亦值得處於公民抗命風潮漸起的我們反覆思索。

我的波蘭朋友時常坐在森林小屋閣樓，透過放大鏡，對著日本金色漆器進行細微的修復工作。偶然間，我們聊起鬼神話題，我驟下結論表示，波蘭人應該不相信鬼魂的存在，喬安娜嚴肅地笑著說：「或許我們只是不承認我們所深信的事。」回到台灣後，我不時在工作室放起波蘭國歌《波蘭沒有滅亡》，當我坐在華沙球賽酒吧吃著午間牛排與啤酒，伴著一群群在午間趕來看網球對決賽並總是溫和鼓掌的波蘭市民時，我不時為這樣的城市的存在而感到激動。華沙起義紀念館的餐廳裡放著一瓶酒，上面標記著「當母國自由時，我們將一起歡飲」，紅酒空了半瓶，但很難判定釀酒者是否等待到幸運之日，但我知道他們所深信的事。